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研究价值

何红一 王平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本文从民族语言学与瑶学研究角度分析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中的瑶用俗字现象, 并举例论证其研究价值。“美馆藏”瑶族写本时空跨度较长, 俗字含量丰富, 可以为汉字俗字研究提供新课题和新视野、通过辨识一批珍贵的俗字字样, 为俗字研究增添鲜活例证、为汉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提供典型范例; 同时在解读、辨析字义、词义等方面, 为瑶族古籍文献的整理和抢救疏通道路。有利于考证、解读文字背后的瑶族文化之谜, 推进域外瑶学研究。

关键词: 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藏瑶族写本; 俗字; 研究价值

基金项目: 本文为项目主持人何红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08BHZ021)《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何红一(1954-), 女, 汉, 河南淅川人,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教授, 中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

王平(), 女, 汉,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 708 号 邮编 430074

一、“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现象概说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 简称“美馆藏”瑶族写本, 主要指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集中收藏的一批瑶族手抄文献, 有族谱、家先单、过山榜文、经书、歌书、历书杂占和蒙学读本等计 241 部, 形式有书册与卷轴。

1. “美馆藏”瑶族写本的文化属性

“美馆藏”瑶族写本由美籍英国商人在老挝、泰国一带收购, 并于 2005 年—2008 年间分批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为是二次收购, 原始书主不得而知。但是通过考证, 还是可以确认这批文献是在“支那战争”中沦为难民的东南亚瑶族流失之物。

东南亚瑶族的祖先源于中国。明清时期从中国云南、广西一带迁徙至越南、老挝境内开垦耕种, 安居乐业。然而, 20 世纪 50-60 年代爆发的“越战”, 使大部分瑶人深受其害, 沦为难民, 逃往泰国难民营, 数年后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欧美一带定居。

这些瑶人手中的大批手抄文献在逃难中流失，被人收购后卖给当地文物贩子。也有的被外国商人集中收购，分别卖给世界各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购了其中一部分，这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写本文献的由来。写本的主人就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一带的中国瑶族，以及“越战”后被作为难民安置到欧美一带的东南亚瑶族。具体为瑶族支系中的“勉瑶”支系，包含有盘瑶（优勉土语集团）和蓝靛瑶（金门土语集团）。书卷以汉字为主、瑶用俗字为辅抄成，保留了中国古代手抄文献的基本特征，也有明显的瑶文化特色。

2. “美馆藏” 瑶族写本中的俗字现象

“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指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批收藏中存在的大量俗字现象。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俗字有千余例之多。

所谓俗字，为汉字系文字中普遍存在的语言文字现象。俗字又称“土字”或“土俗字”，通常指各个时代相对通用的规范正字以外的通俗字。俗字历代皆有，只要有书写现象存在，俗字就会不断产生。俗字多存在于民间手写、刊印、镌刻的文献之中，并以手写本（亦称“写本”和“抄本”）为最。

瑶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抄本所用文字即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再造的俗字。这种文字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古瑶文”、“方块瑶文”、“瑶化汉字”、“瑶喃字”（越南瑶族）和“土俗字”、“土字”、“俗字”等，主要出现在瑶族写本中，与汉字正字一道共同记录瑶族的历史文化。

3. 瑶用俗字出现的历史依据

瑶用俗字出现的时代依据，首先应以瑶族古籍为准。

瑶族两大标志性文献《盘王大歌》与《过山榜》抄本众多，流传甚广，皆以汉字杂以俗字方式抄存于世。其中《盘王大歌》“产生于晋代之前，成形于唐代，成熟于宋代”。¹一般认为，1957年广西金秀长峒乡发现明代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盘王大歌》抄件为最早的同类抄本，它便是以汉字为主，俗字为辅的方式抄成。当然，这已经是相当成熟完善的抄本了。如此篇幅庞大的祭祀歌原始本的形成，还可再向前追溯。^[1]

目前海内外发现的《过山榜》抄本一百余件，署名和涉及年号繁多，自东汉到民国各时代都有，以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出现得最多。《过山榜》同样是用汉字夹杂以俗字抄写。尽管对《过山榜》产生年代尚有分歧意见，但是“近年来学术界分析论证认为《过山榜》产生于南宋的可能性比较大”。²这些瑶族重要文献实物都证明，瑶族使用汉字与俗字的历史至迟自唐宋时期就开始了。

瑶用俗字的出现，还可参考历代文献史料。南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一：融州瑶人“刻木为契约，字画如梵书，不可晓”。清人李宗昉《黔记》卷三：“瑶人，……所祀之神名曰‘盘发’，所藏之书名曰‘旁甌’（笔者注，“盘发”与“旁

^[1]刘保元、杨仁里《瑶族〈盘王大歌〉的最早抄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6）提出：1987年湖南江永发现的落款“龙飞乙丑年”的《盘王大歌》应为南宋咸淳年间即公元1265年抄本，是目前《盘王大歌》最早的抄本，亦为一家之说。

甌”系指“盘瓠”与《过山榜》),圆印篆文,义不可解,且珍秘之”;道光《广南府志》称“瑶人男女皆知书”、民国《马关县志》载:瑶族“有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划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义殊难索解,彼复宝而秘之,不轻示人,愈不可纠正矣”。民国间《连山县志》(卷五)载“(瑶民)儿之聪颖者不与读儒书,惟从瑶道士学,亦有科仪,其文不知晓”。

以上文献所载“字画如梵书,不可晓”、“圆印篆文,义不可解,且珍秘之”、“笔划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义殊难索解,……愈不可纠正矣”、“其文不知晓”,其中当有文人眼中似汉字而非汉字,“字体义殊难索解”的瑶用俗字。

瑶用俗字的出现,还可以综合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古文字、俗字共生现象来考察。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提到壮族、白族古文字,并列举字例十余个。庄绰《鸡肋篇》、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也有类似记述。仿汉字而形成的创字现象,在南方多个少数民族历史上都曾有过,记叙年代多为唐宋时期。各民族在造字文化上的互动与影响应有着发生学上的共同规律。

综上所述,瑶族俗字出现的历史,应与瑶族手抄本时代同步,为满足民间记录家谱、族谱、瑶经、瑶俗和传唱瑶歌需要而生。它的出现不应晚于瑶族重要文献的抄本《盘王大歌》和《评皇券牒》流传时代,当在唐、宋时期。它的盛行,当在明末清初,即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过山瑶”大举向东南亚南迁时期。因为要让本民族历史不至于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流失、中断,妥善保留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历史尤为重要。传抄祖图、族谱、经书、歌本,是当时条件下,一个迁徙民族所能选择的最简便的信息传承手段之一。

二、“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民族语言学研究价值

文字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中介与载体,它承载着人类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重任,同时又是文化的凝聚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瑶用俗字也不例外,在长期的使用与传承过程,已成为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的载体与标志。“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研究的民族语言学意义在于:

1. 为汉字俗字研究提供新课题和新视野

在俗字研究中,南方少数民族汉字系俗字研究一向薄弱。除了壮族古壮字与水族水书近些年成果增多,形成一定的研究实力外,其它少数民族俗字研究稀少,多属于空白状态。几部有影响的汉语俗字论著中,也缺乏少数民族汉字系俗字研究内容,这种现象不符合汉字文化圈的实际情况,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加以弥补。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汉字不仅对我国境内各民族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境外民族文化生活以及世界文化也产生巨大影响。我们知道境外虽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汉籍写本,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这些写本样本大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境外瑶族文献收藏为例,除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以外,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泰国清迈山

民研究院都有大批瑶族手抄手绘文献与实物收藏，其中俗字蕴藏量也是相当大的。对境外瑶族写本俗字展开研究，可以给俗字研究界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参照：观察远离母语，不断迁徙、漂泊的族群，如何保留本民族文化记忆的经验，从而考察在跨文化民族迁徙中所发生的文字学现象。这种考察和研究既可总结汉字在汉字语言环境中运用的例证与共同规律，也可总结汉字在少数民族方言中运用的特殊规律，更可以窥见汉字在异文化包围中顽强生存的典型案例，拓展汉语俗字研究的国际视野。为汉字俗字在跨文化、远距离迁徙族群中的传承和运用提供借鉴。

2. 辨识一批珍贵的俗字字样，为俗字研究增添鲜活例证

瑶族历史上与汉族关系密切，又有抄书传统，历代俗字自然会被抄书者直接吸纳。张涌泉《汉字俗字研究》中所列举的汉字俗字构成类型，在“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中都同样存在着，有些还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发挥。试举几例：

①增减意符：增减意符被认为是俗字产生的最有效途径，“古人用字尚音，或加偏旁，或省偏旁，皆常事也”（清·王筠《隶友蛾术编》卷上）。“美馆藏”瑶族写本经书中，“安龙科”之“安”写作“桉”和“菱”，为原本没有意符的“安”添加了木旁和艹头，为增添意符之例；“救患科”之“救”写作“求”，将“救”的“攴”省去，则为简省意符的例子。

②类化：“人们书写的时候，因受上下文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给本没有偏旁的字加上偏旁，或者将偏旁变成与上下文或其他字一致，这就是文字学上所谓的类化”。³“美馆藏”瑶族写本中“石榴”写作“柘榴”、“血湖”写作“洟湖”、“苧麻”写作“苧蔴”、“盘古”写作“盘盍”……，此类例子举不甚举。

“石榴”中的“石”字、“血湖”中的“血”字本都不应有偏旁，因受后文影响而分别从“木”、从“洟”，平添出偏旁来；“苧麻”中的“麻”字、“盘古”中的“盍”也都不应有偏旁，因受前字影响而分别从“艹”、从“皿”，增附出偏旁来；再如“精细”写作“缙细”，其中“缙”字则是因后文“细”为绞丝旁而改“米”从“纟”的例子；又如“颠”写成“顛”，右边的“真”为左边之“真”旁的重复、龙写作“虺”，三个龙的叠加，都是受字体自身内部结构影响而类化的结果。

③符号替代：符号替代是汉字简省笔画的常见方式，在俗字中应用极广，它的出现符合文字简化发展的总趋势。符号替代通常采用以简代繁的方式，在“美馆藏”瑶族写本中，除了汉文古籍中常见的用“文”字符替代“學”、“覺”、“舉”字中繁琐的字头，形成俗字孝、竟、外，还可以找出更多的符号替代的例证。例如以“旧”替代“臼”的字例：

正字	舊	舅	鼠	寫	春	稻	繚	陷	兒	閤
俗字	舊	舅	鼠	寫	春	稻	繚	陷	晃	閤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字中含“臼”结构，在俗字中都由“旧”

替代，非常有规律性。受“白”变“旧”的影响，亦有将正字中的“臼”和“囚”也变为“旧”的：

“美馆藏”瑶族写本汉字结构“臼”“囚”→“旧”变化对照表										
正字	晨	量	曼	慢	捏	踏	壇	顯	影	瘟
俗字	晨	量	曼	慢	捏	踏	壇	顯	影	瘟

因“臼”、“囚”与“白”形似相混，故被误作“白”，再根据“白”变“旧”的规则，这些俗字中的“臼”也被写作“旧”。

④同近音替代：借用读音相同或相近字替代原字，这种现象在民间抄本中最为多见，也是瑶族写本常见的俗字大类。例如“乔”、“桥”代替“桥”；“鬪”、“鬪”、“逗”、“斗”代替“斗”，“琶”、“樺”替代“耙”，以上为同音替代；“良”、“娘”、“粮”互代；“伏”、“佛”、“夫”、“福”通用；“救”、“教”则为近音替代。

⑤借用现成结构或部件建构新字：如分别用“父”字下面加“上”和“下”字，构成新字𠂇和𠂈（爷娘，父母义）；用“初”与“生”叠加，构成新字“𠂉”，表“嫩”义，显示出造字者丰富的创造能力。

3. 丰富汉字俗字体系，为汉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流提供范例

瑶用俗字是瑶族在汉字基础上，模仿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并加以创新而成。

要创制瑶用俗字必须同时熟悉汉字和瑶语，在灵活使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所需新

字。即按照瑶族方言的读音和意义，或把汉字拆分重组、或将几个汉字合二为一、或增删繁简其结构，这些都需要两种文化功力。研究瑶族文献中的俗字构成，可以了解汉字对汉字文化圈文字的影响，不仅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汉字构成系统，还可以使我们对汉字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对汉字的传播与演变规律有新的认识。

同时，少数民族在使用汉字过程中的独创性和创造精神，也会在俗字构成中得到体现。瑶学专家张有隽教授指出，一些字形与汉字一致的字和词，如吃饭、饮水、父、母、天、地、雨等，读音依瑶语而不是汉语。⁴

例如汉字“苗”，瑶音 [miu³¹]，瑶义为“我”；“邓”瑶音为 [daŋ]，瑶义为“和”；“阳鸟”瑶音 [jaŋ³¹-piou⁵⁴]，凤凰之意。⁵这些字借用汉字的形记瑶音、瑶义，看似汉字，音义与汉字相去甚远。用汉字标注本民族读音，是以往汉字俗字构成类型中所没能包括的，却在瑶族等民族中生动地存在着，是很值得总结的汉字活用现象。

4. 有利于瑶用俗字的研究，为俗字字典的编撰服务

对这批瑶用俗字进行辑录、分类，有利于分析瑶用俗字构成规律，总结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瑶用俗字资料库，为编撰出版一部瑶用俗字字典准备条件。

我国字书字典的编撰都是由历朝历代学人不断地扩充与增补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前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我国字书字典收字率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字书字典在汉族典籍俗字的收录上有长足进步，相比而言，少数民族汉字系俗字的收录则较为逊色。“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研究，能为汉字俗字在域外少数民族汉字系写本的研究提供丰富的例证与珍贵资料。不仅扩大汉语俗字研究的国际视野，还可以给国内外类似写本带来众多的参照字例。

每一使用汉字系俗字民族的俗字整理与研究，都能为中华民族汉字俗字体系大厦的构建提供砖瓦构件，为最终建立完整的汉字文字学体系，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字工具书的编纂作出一份贡献。

三、“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的瑶学研究价值

瑶用俗字是瑶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瑶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其研究意义在于：

1. 解读、辨析字义、词义，为瑶族古籍文献整理疏通道路

瑶族古籍写本中杂入大量俗字，为阅读与考释增添了难度，解读这些写本最首要的就是要过文字关。不识俗字，必然影响对古籍文意的理解，容易造成误读或理解上的分歧，使整理与研究走弯路。

瑶族写本通常在书名、人名中出现一些难以识别的怪字，为校理工作带来困难。例如前文所指出“救患科”之“救”写作“求”（简省意符）或“教”（近音替代）、“安龙科”之“安”写作“桉”和“芩”（增添意符）；科仪之“科”写作“颗”、“稞”（同音替代）、“稞”和“梟”（同音替代+讹变），不解个中奥秘，直接影响瑶族文献的编目与分类。

又如《盘王大歌》“盘王起计”一段（C003）^[2]：

起计盘王先起计，盘王起计重（种）芩麻。

种得芩麻儿孙续（绩之形误，下同），儿孙世代续罗花。……

着芩盘王先着芩，着虱盘王先着虱。

盘王着蕉是也好，唐王着虱更流罗。

歌中所唱“芩麻”为“芩麻”，“芩”为“苧”的异体字。“苧”，音 zhù，多年生草本植物，国际上称“中国草”，中国特有的以纺织为主要用途的农作物，也是瑶族家庭纺织业的重要原料。“苧”即指这种纺织原料，也指以这种原料制成的衣衫。在《盘王大歌》中，“苧”皆被写作“芩”，有时还写作“芋”，与“芋”相似，不仔细分辨，很容易误读为“芋”。其实“苧麻”即“苧麻”，或苧麻织成的衣衫。简称“苧”，而不应理解为“芋”与“苧麻”两种植物。

歌中第二段出现的三个“虱”字费解，很难猜出为何字？从整段歌谣语境来看，歌谣采用对举咏唱的修辞方式，将“虱”与“苧”对举，很明显，这是分别指两种不同的手工织物，丝织物“罗”与麻织物“苧”。“虱”从繁体“羅”简省而来的。保留“羅”字右下部构件“佳”，其余结构“罒”、“糸”用一个简省符号“𠂇”替代，“虱”字遂成。该字在汉籍文献中鲜有见，但在“美馆藏”瑶族

^[2] 括号中的英文字母加序号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整理时所用的编目号，由笔者整理编目，下同。

文旁中间，形成怪字；一本《清醮科》(AB008)也将书主“李玄恩”三字纳入两字头(雨字头的俗体)下，左边加了彡字旁，构成怪字；同样，一本《迓王科》(AH044)，将“东主盘妙能”五字插于“封”字左右结构之中形成怪字。

符篆与汉字历来关系微妙。符的主体是变形的汉字，以汉字的叠合、变形或神秘组合，同时配以神秘图案，是符篆的主要形式特点。“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其造字的原理，班固曾概括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为‘六书。道士造符，也有自己的‘六书，其中的‘象形’，所象为宗教幻想中的形象，‘指事’所指为想象世界中的种种相互作用和关系”⁷。字、符合一，赋以字以灵符的威赫与震慑，是此类俗字功能上的最大特点。

再如“美馆藏”瑶族写本中的《天下两京书》(D002)，其中“丙”字究竟是“西”还是“两”？似乎两者都可以解释得通。早在东汉时，就有人在广东“过山瑶”之乡乳源开筑一条通往京都的道路，叫“西京路”。此道经历代重修，到明代称“西京古道”，是连接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如是观“丙”训作“西”是可行的。但是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改以北京为京都、南京为陪都，“两京”即为两个京城的意思。明代将中国的行政划分为一十三省，通称“两京十三省”。《两京书》首句即为“天下两京，一十三省”，这么看“丙”训为“两”，同样有道理。

“丙”究竟该训为何字？若具备俗字常识，则很容易判断。在《盘王大歌》中可以发现“两”写为“丙”的例子：“番番复复成丙遍，手拿牙筒再来求”(C002)；“寅卯二年天大旱，苧麻根底出青烟。苧麻出来钱文大，一丙称来进二钱”(C003)。两处文献中的“两”均写作“丙”，是“两”字草体俗化的结果。笔者手中保存着一份美国瑶人所赠手抄信歌(讲述瑶人迁徙史)，其中还可见到“两”字的写法，“猛龙皇爷掌朝国，丙王管国不太平。两王管朝不清草(楚)，反得已年困乱民”。句中“丙王”、“两王”一字两写，可以互相印证。

类似“天下两京，一十三省”的句子在瑶族《过山榜》中也多次出现，例如“评皇券牒，发天下一十三省，南北两京”⁸。同书内第330, 346, 352, 422, 437页所录的《过山榜》文中也有大同小异的句子。

综合多种因素，此处“丙”为“两”无疑。再根据历史上中国古代行政划分制度分析，还可进一步判断《天下两京书》写本母本形成当在明代。

3. 有助于整体了解瑶用俗字发展状态，从语言文化入手推进国际瑶学研究

“美馆藏”瑶族写本中大量俗字是在繁体基础上的再造，证明其产生年代是在汉字简化之前，为考证瑶族写本文本形成时代提供断代依据。

再有，大量俗字来源于汉字借源字，证明瑶族历史上与汉族文化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又有不少俗字与古壮字有交叉现象，说明瑶壮双方在地缘交往和文化交往的密切关系。再有一些俗字与东南亚俗字，甚至与港澳台、新加坡、日本等海外汉字系俗字都有相同、相近之处。例如“凡间”之“凡”、“徙”之“徙”、“姊妹”之“姊”、“银两”之“兩(尹)”、“喜乐”之“樂”、“离别”之“离”、“飞”之“飛”、“逃”之“逃”、“钱”之“錢”、“纸”之“紙”、“埠”之“埠”、“廳”之“厅”、“烟”之“烟”、“壹”之“壹”，这些俗字不仅在欧美、东南亚瑶族中通用，而且与台湾、新加坡、日本等地域的某些汉字俗字也有相似之处。说明海外瑶族与这些国家和地域汉字文化有过接触，交流与碰撞。依据上述俗字的地

域特征，绘制瑶用俗字分布图，可为瑶族向海外迁徙线路提供参考依据。

以“美馆藏”瑶族写本俗字研究为起点，与境外其它国家瑶族文献收藏中的俗字进行比对校理，找出其中相同因素，有利于了解汉字俗字与他文化交流的动态、总结跨民族交流的规律、破译文字背后的文化现象，从语言文化角度推进境外瑶学研究。

¹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90。

²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1-23。

³ 张涌泉《汉字俗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63。

⁴ 张有隽《瑶族历史与文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167。

⁵ 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00-101。

⁶ Lucia Obi, Shing Müller, Xaver Götzfried: *Botschaften an die Götter: Religiöse Handschriften der Yao. Südchina, Vietnam, Lao, Thailand, Myanmar*, Herausgegeben von Thomas O. Höllmann und Michael Friedrich.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99, p38.

⁷ 刘仲宇《道符溯源》，[J]《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

⁸ 黄钰《评皇券牒集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9。